

《羽书》遭剽窃与冒名的“吴伯箫”

1941年5月,被收入巴金主编“文学丛刊”第七辑的吴伯箫散文集《羽书》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大约一年半之后,北京《吾友》杂志公布该刊一年来遭遇的抄袭事件,其中一例,是化名吴鼎甫者对《羽书》集内散文的抄袭。又,与此次抄袭事件差不多同时,上海某杂志上却有冒吴伯箫之名发表的另外一些文章……这种种好事与坏事,当时远在延安的吴伯箫本人均一概不知。

而到了1949年7月北平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从东北赶去参加会议的吴伯箫与巴金见面,巴金第一句话就问:“你的稿费收到了吧?”这一问,更是把吴伯箫问愣了。

我有点吃惊,我没有把稿费跟出书联系起来。说:“什么稿费?”“你的《羽书》的稿费。”我才想到巴金同志正是《羽书》的抚育恩人。

“还有稿费么?”“寄给你两次稿费,你没有收到?”“稿费寄到哪里?”“济南。”“抗战八年我都在延安啊。”“哎呀,这里边有鬼,受骗了。《羽书》一出版,我们就寄稿费给你’。’你’收到以后,用左手写一封信给我们,说是右手在跟敌人作战受伤了,希望再寄一点稿费养伤。我们就又寄了第二笔。……”

“是啊,真是受骗了!”心里想:冒名的人该是谁呢?

令吴伯箫惊讶、尴尬的还不止于此,当他开完会回到长春,竟然又在斯大林大街附近的旧书摊上看到一本记载他“死讯”的小册子《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文化人》。这个小册子我一直没找到,但温州已故诗人莫洛所著《陨落之星——十二年来中国死难文化工作者》(上海人间书屋,1949年1月初版发行)也有一篇《吴伯箫》,却也有差不多相同的说法:“后来他回到济南,全家被日寇杀戮,并强迫他参加和运,他正义拒绝,惨遭酷刑,以致残废,其当时生活艰苦,赖卖文度日,后贫病交迫,在一风雨之夜,默默死去”。只是“默默死去”一语与那本《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文化人》所云“被敌人活埋”不同,应该不是同一本书。不过莫洛的孙女后来写过一篇博文,猜测其祖父的记载可能受到当时上海《杂志》张金寿文章的影响,此文说在济南遇到了“事变前文艺界鼎鼎大名的吴伯箫先生”,而在张金寿笔下,这位“吴伯箫先生”“两条腿坏了,勉强蹭着走,远一点路便不行。他苦得很,最近正欲卖书,文人到卖书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如何贫困。”张文又说:“吴先生言语甚为凄惨,他说:‘我如果不死我们还见得着的。’这是我们告辞时的末一句话。他的肺病程度甚重,且又贫穷,疗养谈不到,所以好起来是颇费时日的。他现在住在他弟弟家,仍不时写文



章,往上海的《文潮》,山东的《中国青年》,北平的《吾友》发表,真是苦不堪言。”

由张文言及北平《吾友》再联系邵燕祥《想起了吴伯箫》中的一段话,《吾友》抄袭案、《羽书》稿费冒领案、济南“吴伯箫”投稿上海案似乎就慢慢呼应起来了。

邵文回忆他最早知道吴伯箫就缘于此次《吾友》抄袭案:“大约1943年或1944年前后,沦陷区北京有一家名为《吾友》的期刊发表了《灯笼篇》,那浓郁的乡风诗情一下子吸引了少年的我。过后登出启事,说是投稿者从吴伯箫的《羽书》抄袭而来。从此知道有吴伯箫其人,《羽书》一集,心向往之。”

沿着这条线索,我先找到了《吾友》,1944年未见记载,1943年2月却意外先看到了一篇署名“方坪”的读者就《羽书》抄袭案专门为杂志撰写的《关于〈灯笼〉的“谜”》,以他与吴伯箫在晋南共事一段的亲身经历证实了济南吴鼎甫冒名顶替而又抄袭《羽书》之“谜”：“当去年暮秋,我投身新的环境时,吴伯箫却早回延安了。显然的,《羽书》的作者是吴伯箫,而不是现在济南的吴鼎甫了。有人说:人生是谜,最好不探究竟,这样活下去,才算好的生活。但是,我应该奉劝吴鼎甫先生,不要为了原作者不会登报声明,而冒名顶替,偷他的文章已经够多,但偷他的名字,未免不近人情,生财之道是很多的,千万不要发昧心财,其实千字二元的收入,能值几何呢?请不要成名心切,想列入作家之林,还是关门读书,以待来年吧。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抄袭者应受如何处分,但就事论事,却总不大好呢!”

果然,接着往前翻,终于在1943年年初的三卷二期找到了“编者”的启事《一年来的抄袭》,其中涉及吴伯箫《羽书》的是这样一段:

经本市杜志文君及本报稿友胡秉君来函谓《灯笼篇》一文原刊于上海文化生活社之文学丛刊《羽书》一书中之五十五页,题名《灯笼》,作者名为吴伯箫(箫,当为“箫”,原书印错。予张按)。胡君并将原书附来,并谓“最好与作者去一信询问,是否即其本人,因或者他将原稿交沪上,但出版与否不自知。该文文章极好,如系吴伯箫本人,倒可请他多写稿的。”查《羽书》于三十九年五月初版,在上海发行,吴君寄本社之稿除已刊之《灯笼篇》外,尚有《黄昏之花》一篇未刊,所用稿纸印有“丁夫自用原稿纸”字样,题上用有“丁夫”二字

仅限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件。

这些信件见证了彼此间的深厚友谊。在信中,吴向雷或详述开会时所见的所感(第一、二、四封),或交待看望好友马加的过程(第三封),或诉说因事务缠身而不能投入创作的苦恼(第二、四封),或交流具体的阅读体验(比如:在第四封信中,他说他阅读《白绢花》时被感动得落泪),或为好友在文学创作上的作为而表达钦佩之意(比如:在第六封信中,他为收到《从冰斗到大川》而欢心雀喜)……都可看出吴、雷之间在私人关系上的不同寻常。我们知道,吴、雷二人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干部;从1946年到1953年,吴在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前后凡8年,先后为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教育学院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45年东北解放,雷回故乡东北任安东造纸厂厂长;后来他们又都离开东北赴京工作。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北京,二人始终相伴而行,他们因工作和文学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可谓深厚。这就不难理解吴在信中为什么无所不谈的根本原因了。

前几年,笔者曾赴莱芜参观过吴的故居,其内部景象实在让人无语。不仅刻有“莱芜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由院外搬到院内,而且故居因长期无人管理和修缮而变得异常破败、凄凉。事实上,不仅故居保护与开发不尽如人意,与吴有关的史料(日记、手稿、信札、版本、照片、文物)整理与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他尚有不少资料藏于他处或流落于民间,其价值不可忽视。我在网上常看到吴伯箫信札以及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宗日记等材料被个人或商家予以拍卖的记录——概因其名声与自成一体的书法,拍卖价格倒也不低。无论作为文化地标地的吴伯箫故居,还是散见于民间的各类资料,都有待文史学者们给予关注和研究。

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确辛苦,你必须在“资料堆”里不断寻找、比对,并判定其价值有无,而很多时候,你付出时间与心血,未必能换来收获。但持之以恒必有所得,近年来,我因工作需要,参与整理过许多文学名家的日记与书信,比如茅盾、巴金、曹禺、梁斌、丁玲、吴祖光、柏杨、徐迟、萧三,等等。这不仅对我从事的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和文库管理工作大有裨益,也为推进经典作家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吴的这7封信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有效进入研究者视野,全得益于捐赠者们的无偿惠赐,现辑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附:书信七封

两点说明:1、“()”为暂不能识别的字。

2、“(?)”为暂不能确定的字。

吴伯箫《羽书》剽窃案及其他

□子 张

之小章,署名下有“吴鼎甫”之方印,文末又有“吴伯箫”之方印。吴君原住济南,《羽书》中各文末亦印有作于济南或青岛之字样。由此种种《灯笼篇》及《灯笼》作者出自一人,当属无疑。

由此可知,署名吴鼎甫、刊载于《吾友》第二卷第八十八期(1942年10月21日)之《灯笼篇》,其实就是《羽书》集里头的《灯笼》,而所谓吴鼎甫、丁夫、吴伯箫(原署“吴伯箫”)云云,也皆为同一位冒名者。抄袭更兼冒名,真可谓盗名欺世而又用心良苦。

我也经由曲折曲折的路径,找到了这位济南“吴伯箫”在同时期上海《风雨谈》杂志上的冒名之作,所写文章除署名“吴伯箫”或“吴伯箫”之外,往往另有“历下谬謏斋”的落款,而那些文章的内容与写法与真实的吴伯箫大相径庭,却是一看即知。不过同时也看得出,这位“济南吴伯箫”于文史、文学的确也非外行,甚至还颇有一些考证、批评的功底,实事求是言之,也该算得上一位水平不低的文人墨客。而他之所以一定要冒“吴伯箫”之名行抄袭、发表之事,推想起来大略不外乎两端:一是出于什么原因穷愁潦倒,借此蒙骗些稿酬;二是此人对吴伯箫在山东前后的情况有所了解甚至相当熟悉,估计吴伯箫在延安不会知情,乐得盗用一下吴伯箫文名实现发表作品和赚取稿酬的目的。果然,除了北平《吾友》的抄袭启事,在济南和上海等地的冒名就都一路顺利,着实成功蒙骗了不少人(包括巴金和那位在济南“遇见”他的张金寿)。远在延安的吴伯箫本人更是完全被蒙在了鼓里。

可是也幸而没有被延安的政治审查者看到,否则正如吴伯箫晚年所言:“搞这种伎俩的人也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因为“若是刊物落到‘理论权威’的手里,那不会被看作是‘通敌’的罪证吗?”

到这里,关于《吾友》抄袭、《羽书》稿酬被冒领、冒名发表论著以及张金寿济南采访涉案总算大致交代过了,能够确定的是,几个案子的作案者其实只有一个,即落款“历下谬謏斋”者,而其真名究竟是否“吴鼎甫”或“丁夫”,可就不得而知了。

在补订拙编《吴伯箫年谱》过程中,我也曾与《吾友》抄袭案的见证者邵燕祥先生讨论到此事,而邵先生在为这部年谱撰写的序言里也再一次谈及他对该案的看法,殊多趣味,这里限于篇幅

不再作征引。好在《年谱》即将问世,届时感兴趣者或者可以找来看看。

王统照、巴金与《羽书》出版

《羽书》是吴伯箫第一个正式出版的作品集,也是使他跻身于京派散文后起之秀、奠定文学史地位的标志性成果,1941年5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翌年1月出版桂林1版,1982年12月又由广东花城出版社重版。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处女集,作者吴伯箫却对其当初在上海、桂林的出版毫不知情,连稿费也遭冒领。而四十余年后重版本问世的时候,吴伯箫又已过世数月,竟也未能看到。

不能不令人叹惜再三。好在重版本的前面,补上了当初王统照撰写的序言,后面又增加了吴伯箫生前写就的“代跋”——《〈羽书〉飞去》,将《羽书》曲折坎坷的出版过程作了详尽的交代,总算较为圆满,遗憾中遂有欣慰。

于这篇“代跋”——《〈羽书〉飞去》中,吴伯箫在回顾了卢沟桥事变后将《羽书》稿本“托孤”给王统照剑三的往事之后,接着就提到第一次文代会巴金见到他询问稿费是否收到时的情景,除了对稿费被冒领的意外,一句深情的感激话语亦随之道出:“我才想到巴金同志正是《羽书》的抚育恩人。”

事情过去近80年,当事人都早已不在,要想搞清《羽书》从剪贴稿本变身为正式出版物的细节,或已不易,特别是王统照先生是如何转交巴金而巴金又如何将之列入“文学丛刊”第七集的细节更是难以窥知。对此,吴伯箫本人也留有遗憾:“第一次文代会,剑三晚到两天。郑振铎先生忙着邀巴金同志等作陪在翠华楼替他洗尘。席间大家畅怀交谈,真的‘把杯痛饮’,我竟忘记问起写序的事,更没谈起《羽书》的出版过程。”由此,《羽书》序言的撰写和出版过程成为文学史中失落的环节。

不过,文学史的意义却还是因《羽书》的出版而产生了。盖《羽书》者,乃吴伯箫1930年代初北师大毕业后重回山东从教期间所作散文的集结,写作时间集中在1933至1936年的四五年中,数量不过18篇,上海竖排版页码为118页,花城横排版加上序跋也不过百余页,实在说不上厚重。

吴伯箫致雷加》辑录记

张元珂

吴伯箫,笔名山屋、天荪,山东莱芜人,著名散文家、教育家;雷加,原名刘天达,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人,为“东北作家群”的代表人物之一。吴、雷二人私交甚好,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间,彼此通信往来,留下了不少有友谊的书信。这些书信不只在见证二人友谊,更在诠释一段历史,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吴、雷通信记载了很多会议活动。“文革”结束后的二三年间,中国社会新旧交替,思潮涌动,但一切似乎又不明朗。一方面,思想和政策层面尚摇摆不定,另一方面,社会共识逐步形成,即使不那么清晰明朗,至少作为一种朦胧的认识与实践已深入人心。无论在第一封信中吴说出版局召开的座会是“十年来第一次”,在第四封信中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他“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遇到的第一次这样规模的会”,还是在第二封信中所言及的巴金、罗荪、厂民、欧阳山等作家的文学活动以及他们在创办刊物、恢复文联组织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都可看作是这种认识与实践的充分展现。信中所描述的这些事件都与彼时上至国家层面下至民间社会的主流潮汐息息相关,故其通信就具有记录与补证历史的价值。

这些信件的另一价值在于较为充分地展现了“文革”结束后二三年间吴在工作 and 创作上的基本动态。在第一封信中,吴说拟去参加的大学外语教材座谈会实乃“吃十年前的老本”;在第三封信中,他由去看望马加,结果扑了个空,于是心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的感慨;在第四封信中,他感慨于业务生疏,觉得自己“像民兵转正,而整天忙于事务,荒废写作,于是情不自禁地向友人倾诉:“一个季度到了,今年我还没动笔。真可怕。”而在第五封信中,他直接说:“在我,当‘票友’仿佛还可以偶尔来一段‘清唱’,‘下海’反而‘跑龙套’都勉强了。原因是掉进了没有‘生活’又没有时间‘创作’的文艺队伍里。深悔到文学研究所早报到了两个月!”并希望跟随代表团下基层体验生活。这种时不待我、奋起直追然而又深感力不从心的体验,何尝不是整整一代人的际遇!

吴、雷通信还涉及不少文人间的交往故事,特别是其中一些细节,都可作为研究“文革”结束后不久文人间交往与交游动态、心态提供一手资料。巴金、罗荪、厂民、欧阳山、沙汀、马加、荒煤等在信中所提及的这些文艺界人士都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所以,信中所提及的他们在“文革”后的文艺活动以及交往动态也都不

仅限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件。

这些信件见证了彼此间的深厚友谊。在信中,吴向雷或详述开会时所见的所感(第一、二、四封),或交待看望好友马加的过程(第三封),或诉说因事务缠身而不能投入创作的苦恼(第二、四封),或交流具体的阅读体验(比如:在第四封信中,他说他阅读《白绢花》时被感动得落泪),或为好友在文学创作上的作为而表达钦佩之意(比如:在第六封信中,他为收到《从冰斗到大川》而欢心雀喜)……都可看出吴、雷之间在私人关系上的不同寻常。我们知道,吴、雷二人都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干部;从1946年到1953年,吴在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前后凡8年,先后为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教育学院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45年东北解放,雷回故乡东北任安东造纸厂厂长;后来他们又都离开东北赴京工作。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北京,二人始终相伴而行,他们因工作和文学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可谓深厚。这就不难理解吴在信中为什么无所不谈的根本原因了。

前几年,笔者曾赴莱芜参观过吴的故居,其内部景象实在让人无语。不仅刻有“莱芜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由院外搬到院内,而且故居因长期无人管理和修缮而变得异常破败、凄凉。事实上,不仅故居保护与开发不尽如人意,与吴有关的史料(日记、手稿、信札、版本、照片、文物)整理与研究也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中,他尚有不少资料藏于他处或流落于民间,其价值不可忽视。我在网上常看到吴伯箫信札以及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宗日记等材料被个人或商家予以拍卖的记录——概因其名声与自成一体的书法,拍卖价格倒也不低。无论作为文化地标地的吴伯箫故居,还是散见于民间的各类资料,都有待文史学者们给予关注和研究。

史料整理与研究的确辛苦,你必须在“资料堆”里不断寻找、比对,并判定其价值有无,而很多时候,你付出时间与心血,未必能换来收获。但持之以恒必有所得,近年来,我因工作需要,参与整理过许多文学名家的日记与书信,比如茅盾、巴金、曹禺、梁斌、丁玲、吴祖光、柏杨、徐迟、萧三,等等。这不仅对我从事的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和文库管理工作大有裨益,也为推进经典作家研究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吴的这7封信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有效进入研究者视野,全得益于捐赠者们的无偿惠赐,现辑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

附:书信七封

两点说明:1、“()”为暂不能识别的字。

2、“(?)”为暂不能确定的字。

仅限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件。

雷加同志: 国庆好! 希望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你没碰到了君。同往首都,并没事先邀约。看来语谈也是不畅(?)的。大家忙于工作,倒是好事。沙汀从成都来,两同志走访(他住人民文学出版社招待所)都扑空,在出版局召开的一次(十年来第一次)座谈会上才见面的。你去郑州,从郭士明同志处知道去的意向,收获不小吧?去年我去时是从广州北返的第四站,往回走时已经落雪了(目前在广州还穿短袖衫)。老想读读你写的西双版纳。 三五天内拟去嘉定参加大学外语教材座谈会(吃十年前的老本),往返预计半月,回来再来看你。 伊唯同志好! 握手。

吴伯箫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日 王笠夫同志打听你的住处,告诉了他,来看你了吧?又及。

二

雷加同志: 我今早八点一刻刚从上海回来,来看你。你又不在家,我一边喝茶一边写下边几句话。

去上海是参加大学英语教材座谈会。趁两个星期天,看到了巴金、李俊民和罗荪同志。并在罗荪家里碰到了厂民、罗荪在编《上海文艺》,月内出版第一期,很有干劲。厂民是从无锡去上海,要办退休后复职手续,还没办妥,正为此焦心。他们上了“四人帮”在东北的爪牙的当,去年退休,落草到现在,绝不会干这种坏事。

接广州来信,那里开了文艺座谈会,欧阳在会上发言,很受欢迎。仿佛要恢复文联组织,稿费(资料费)也想解决。后者无组织,前者对文艺工作者推动将是大的。从《北京文艺》读到你的《一张地质图》,文字精炼,写得好。开始忙教材,今年剩下的八周,我怕动笔不得了,只好读同志们作品。

这期间你来沙滩两次,我都不在家,真是憾事! 畅谈的机会总会有的吧?祝好。

吴伯箫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仅限于私人领域的个人事件。

雷加同志: 来驾又一次相左,实在太巧了。 这次我是来看马加。马加来京是我从你处听说的。于卓告诉我,请马加来京看病,往北影招待所,又说每天三点后准在家。上午听说,下午就来看他,不想扑了空。招待所房间很多,但寂无人声,只有一个男同志在水房洗衣服,对来访客人也不热情。北影实际工作如何不了解,从招待所看,仿佛有点不景气。到北影北门对过人教印刷厂看看,又到北太平庄饭馆吃了烩饼,天黑了,再去到()人处打听,说还不在于。再加半天,去沈阳也到了。忽然想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深有感触。 马加什么病你听说过吗?于卓说他走几步就脚麻。要停一会才能再走,不知是什么病。 耳“背”,不愿用电话,想什么时候约到一起唠唠? 最后祝好。 伊唯同志不另! 府上几个青年,都成人了。接触很亲切。 留下报纸一角,是不是有珍惜《岗位》之意?谢谢!

吴伯箫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八日

三

雷加同志: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是我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遇到的第一次这样规模的会,自己力争作为社会科学院代表之一参加了。住在西苑饭店849号。晚上没事,回来看看,读到你今天来信。

社会科学院我是三月二十七日报到的,三周来没正式工作,只同沙汀、荒煤一起搞《规划》,了解情况。估计教育会议后要上套了。像民兵转正,票友下海,缺少拿手戏,心里并不踏实。 小书一本,正对封面设计有点意见(是秋夜,不是春(?)天),听你说“极好”,深用慰安。

忙于写作(),回味上次见面时你说:“新(?)写作就是幸福”,益(?)有同感。又是一个季度到了,今年我还没动笔。真可怕。 伊唯同志好! 著祺!

吴伯箫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白绢花》,回来又连读两遍,感动得落泪。又及。

五

雷加同志: 征求意见稿认真读了两遍,动了几处字句,不一定对,供参考。 看到近来发表不少作品,看到这篇《从生活谈起……》,想到你说过的“新(?)写作就是幸福”,现在我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在我,当“票友”仿佛还可以偶尔来一段“清唱”,“下海”反而“跑龙套”都勉强了。原因是掉进了没有“生活”又没有时间“创作”的文艺队伍里。深悔到文学研究所早报到了两个月!

目前因眩晕不曾住首都医院十天,出院后休息两周复查,结果除“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尚无大病。又上班十天了。 因此大好机会去大庄参观,()()报名第一批。 曾妄想活动到你们创作组去,跟跟透露透露,不知你有什么门路没有? 著祺! 伊唯同志好。

伯箫 一九七八年中秋

六

雷加同志: 承赠《从冰斗到大川》,不胜惊喜。 还没读,先来鼓掌;绝不是矫情,实因去年读了你几篇优美的散文之后引起的这种条件反射。具体感想,容读后再说。 祝好。 伊唯同志好!

吴伯箫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

七

雷加同志: 来访未遇。 在屋里等你的是辽宁师范学院康平同志,他受教材编辑会议的委托写你的《作家编》。因为电话(337556)打不通,特地她来看你。她不远千里而来,明天就要回沈阳,所以留她在家里等你。 康平同志在你故乡住过十年,在你当厂长的纸厂劳动过,写你的《作家编》是知道的。 敬礼!

吴伯箫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二日